

# 中国山水画的情绪基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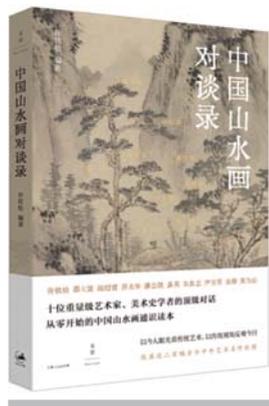
□禾刀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至今我们吟诵唐代诗人王维的《鸟鸣涧》，眼前依然会浮现出一幅胸中丘壑的山水图。苏轼就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早在南北朝，宗炳便以《画山水序》奠定了山水画的理论。《中国山水画对谈录》收录了著名画家许钦松与邵大箴、郎绍君、薛永年、潘公凯、易英、朱良志、尹吉男、余辉、吴为山九位艺术史家、艺术评论家的对谈。对谈内容从中国山水画深邃的历史起点，到古人为什么会从当初的人物画“移情”山水，后又到山水画与文人的紧密文化纽带，以及山水画与书法笔墨“尖、圆、齐、健”有着异曲同工的“四德”之功。对谈还比较了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的异同，即中国山水画家创作者的士大夫阶层与西方风景画以商人为主体的区别。

中国山水画与古代士大夫的生存状态唇齿相依。士大夫是文人，但又与一般文人不同。“士”首先是学问家，是儒家的“君子”、道家的“贤者”，是有一定精神追求的一批人。文人成为士大夫后，才能将文人身份与时代治理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山水画欣赏与评价的话语权主体，士大夫的意见反过来又会影响山水画的创作走向。

古代文化的核心是诗性，所以，中国“山水画有一个核心的文学属性，那就是诗性。山水画家本身就诗人一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许钦松 编著  
《中国山水画对谈录》

样，被某种诗性启发，然后通过艺术想象力，达到了‘道’的境界”。谈中国山水画，必谈宗炳的《画山水序》。宗炳“喜欢游山玩水，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就把山水画在墙上，躺在床上看，名为‘卧游’”。即便是中国山水画的启蒙阶段，宗炳对山水画的非限于奇山异水产生的视觉冲击力，而是坚信“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之理，认为山水画的创作本质是追求精神上的“悟道”。

道法自然。“道”是一种自然法则，同时也是人类认知自然归纳的结果。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哲学认识，所以中国山水画一开始就不是视觉具象的克隆式表达。近代著名画家李可染就曾直言，中国山水画“不与照相机争峰”，所以中国画虽然有山有水，但又不是简单的山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由于作画者的文人特质，于是常

常自带诗性，所以，“中国山水画中有‘话’，画中有诗”，这种诗性往往会浸润作画者的个人情绪与情怀。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赏家余辉擅长从文人情绪角度分析，“我们的文人情绪不好了，或者失意了，就要到山里去隐居。而西方人情绪不好或者失意的时候，是到海边去，要看大海”。东西方个人情绪的外化表现方式，不可避免地投射到画作之上。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山水画以山水内容居多，而西方风景画中海题材更为普遍的原因所在。

中国山水画从来没有脱离过所处的时代，只不过不似西方风景画那般直接。北宋虽然经济发达，但北方侵扰不断。于是，士大夫愈发渴望拥有一种强大的“家国情怀”，以抵御北方的入侵，所以那个时期的“画家描绘的山都非常伟岸，非常崇高典雅，有一种‘浩然之气’”。自宋以降，“中国山水画的性质越来越向‘非山水’发展；一片山水是一片心灵的境界，重点不在于表现外在的状态，而是要展现自己心中的独特境界”。士大夫对独特境界的追求，其实也是对现实的某些无奈，著名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邵大箴认为，画山水画“讲究‘心境’，讲究品德、品格，并不积极参与社会现实”。

因之，中国山水画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山水镜像。或者说，胸中丘壑，更像是中国山水画的情绪基因。

(作者为书评人，武汉道桥公司员工)

# 回忆是心底的风

□逢金一

继《为文有时》之后，刘君再次以独特的才情与智慧，创造完成另一座文字迷宫《向阳坡上》，不由人不驻足、流连、赞叹、沉思，还有烧脑——读作品的过程自然也是破解走出迷宫之法的过程，不烧脑是不可能的。

刘君有她自己的创作密码。她的作品，会让你慢慢沉静下来，清澈下来，而她的内在世界远比我们感受到的更为绚烂丰饶。诸多让人心颤的细节描写，如珍珠般随手撒播各篇什，俯拾皆是，也许它们就是找到这座迷宫出口的重要线索。

“冬天的早晨，爸爸送我上学时天还未亮。我因为早起困得睁不开眼，妈妈怕我打瞌睡坐车不安全，竟想了个办法，将我打背包一样绑在爸爸背上。一路上，我把脸贴在爸爸的背上，手插在他的上衣口袋里，暖烘烘的。”——这样难得的生活细节，一定会像打背包一样，绑定在我们脑海，让我们甩都甩不掉。

“我记得刚出月子时，要去邻市办一件事，但车开出去没多久，我就下车返回了，我没办法想象跟他分开几天会怎样。”——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情感，在这样的细节面前，还需要更多辅助说明吗？那些滚烫的字眼根本就无需落在纸面上。

“五七连的人来自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有的时候她们会以地名称呼彼此，比如叫妈妈山东。妈妈那阵子是个小领导，所以我总是听到她们山东长，山东短。山东，你给评理，山东，你说这应该怎么办。但有时也会戏谑，山东吃大葱，放屁咚咚咚。立刻有人替妈妈反击，你河南大裤裆，滴里当啷到新疆。”——读者诸君，您也给评理，这些细节是不是特别形象生动，让笔下人物呼之欲出？

刘君还有个特殊的创作心态，值得研究者关注。在《时间的意义》中，她提到：“我突然意识到，流浪和迁移于我是一件多么平常的事情。”在《生命里那些仪式》中，她说：“流浪和迁移，似乎是我们这个家族血脉中的特殊基因。”在《再见柳江》中，她也提到自己内心的“孤单飘零感”。甚至从儿子的绘画作品中，她也敏感地捕捉到儿子内心那种“深深的孤独感，无依无靠”。

除了家族三代人的现实经历外，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也是人类固有的心理使然。人本质就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感与迁移心态，给予刘君开阔豁达的人生态度、强烈的时空纵深感、深湛的苍茫意识、惶惑不定之思——这不也正是茫茫宇宙中人类自身的真实写照吗？

不过，幸好刘君精神特质中还有回板的一面，即对俗世之乐的接受与自甘：“当年他教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史，曾用气吞山河的底气，字正腔圆的陕西话朗诵郭沫若的诗词，‘饿(我)是一只天狗啊，饿(我)要把日来吞了，饿(我)要把月来吞了……’”——这让人喷饭的朗诵，估计每人每次读来，都会乐不可支。

情感馥郁都是刘君散文的一个特点，而密实的人生哲思生发是她作品的又一特点。关于生死、时间、情感、爱、真实与虚幻、此岸与彼岸，刘君都有自己的个性分享。“把这个字拿掉后，我的人生一定会有什么不一样吧。”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名字是在一个世界的证明。”“名字一旦被夺走，就无法找到回家的路。”——说得如此郑重与深刻，我心里是极为认同的。

只有读完整本书，我们才能较为完整地拼凑出刘君生命与精神世界的全部，包括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诗人妹妹，画家妈妈，写诗与教书法、英语的舅舅。刘君本人也写诗，而且诗格不低，“我们相依相伴到这里/只是为了分离吗/我们急急地赶到这里/只是为了说再见吗”——极有韵味与哲理，饱含深情，引而不发，仿若朦胧诗。

那个出生在新疆地窝子，在农场仓库上幼儿园，喜欢盯着窗外的天空发呆，至今依然喜欢看落日的早慧的孩子，在夏日微风一样的娓娓叙述中，有模有样地向读者走来……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



《向阳坡上》  
刘君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青岛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

□刘大军

2019年初夏的一个下午，我被连绵雨幕阻隔了行程，望着宾馆窗外红瓦绿树的景色发呆。忽然想起近来常常路过的青岛市图书馆，在它浩瀚的书海里，或许隐藏着某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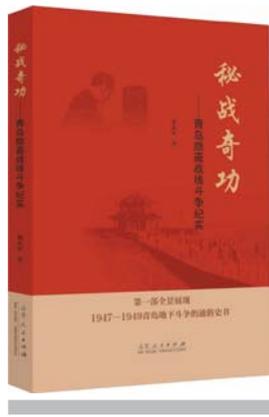
茶香幽幽，雨声淅淅，翻开《青岛革命回忆录》简朴而又庄重的红色封面，十五篇记述青岛隐蔽战线斗争的回忆录，作者默默无闻，文字平实无华，却像一声声震人心魄的炸雷，闪现出七十年前无声的战斗一幕幕惊险奇绝的场景：

自筹资金成立的远通利船行，拥有分支十多处、员工100多人，这个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的私营企业，实际是中共胶东区委的秘密情报站，派遣人员遍及日本、东南亚以及中国香港等地，宣传党的政策，采购紧缺物资，搜集大量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怀疑、误解、怠慢、冷遇，“大商人”徐行健在革命队伍中受尽委屈却初心不改，自费开设普兴东商行秘密联络站，以国共实控区交界的平度南村作为前沿据点，向青岛工商界上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为保护工厂和市政设施免遭国民党军破坏，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刘萍利用关系打入国民党军的计划未能成功，但他凭借精明过人的胆识和宽厚谦和的品行，赢得了国民党军警实权人物以及商界大佬的信任，不到两年华丽转身变成了“刘公馆”的大老板，为建立秘密情报交通中枢机构打下可靠的经济基础。

豪门闺秀王继川是一位没有任何秘密斗争经验的“情工素人”，奉命到青岛执行潜伏任务期间，三次遭逮捕，经常被讯问，长期受监控，却在特务的眼皮下获得了大量情报，尤其是国



《秘战奇功：青岛隐蔽战线斗争纪实》  
刘大军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民党军撤离青岛的绝密计划，为中共中央解放和保护青岛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我怀着猎奇的心情，开始搜集青岛隐蔽战线的有关资料，着手写作《秘战奇功：青岛隐蔽战线斗争纪实》一书。早在1948年济南战役结束后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马歇尔：“攻占该城的中共9个纵队目前可以对其他地区自由采取军事行动，仅抽出小部分兵力便可攻占烟台和青岛”。然而解放军主力部队并未立即进攻青岛，而是陆续南下参加淮海和京沪杭等战役，直到1949年6月2日，青岛这座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海港和工业城市，才像一颗熟透的果子，完整无损地回到人民手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并非军事，而是政治。

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解放军进攻青岛不是为了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而是以“威胁性攻击”，达到“迫使敌人早日撤退”“并能防敌破坏”之目的，同时“避免与美军作战”。解放军如果攻击太猛，国民党势必要做困兽之斗，甚至借机拉美军下水，造成局势的进一步

混乱；如果进展过缓，国民党可以毫无顾忌地大肆破坏工厂、水电和交通设施，将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危害。

在这种极其严峻和复杂的形势下，青岛隐蔽战线以非凡的胆略、周密的部署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在统战、策反、情报、护厂等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协助解放军在与敌人兵力基本相当的情况下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追着国民党军队的屁股进了青岛，敌人仓惶上船，来不及破坏，很完整地接管了这个城市”。

据国民党元老雷震的日记1949年5月6日记载：“今日经国见告，青岛之刘安祺师长将青岛之主和分子三百二十余人丢在海中，内有立委二名，此辈均为主张局部和平者，经国颇赞成此办法。”我曾经采访过家住胶东路10号的张如媛老人，她回忆说：青岛解放前夕，前海沿几乎每天都有被潮水冲上来的尸体，由于被海水长时间侵蚀得面目全非，实在无法辨认，只能草草埋葬。《我军伤亡统计表》记载，青即战役解放军阵亡人数共计417名；而青岛隐蔽战线牺牲人数，仅以雷震日记所载320名为计，即达前者的77%，斗争之严酷，牺牲之惨烈，由此可见一斑。

青岛隐蔽战线为胶东乃至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这些英勇无畏的战士和惊险动人的事迹，为什么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呢？在采访中，隐蔽战线老战士的后代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父母从来不谈地下工作的事情，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些老战士遵循周恩来对情报工作人员“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受气不叫，有苦不说，舍己救人，冒险犯难，埋头苦干，长期艰苦奋斗”的要求，终其一生低调做人，不求功名，甘于寂寞，无怨无悔，是当之无愧的无名英雄。

(作者为文史研究撰稿人)